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五六期 ——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6g)

【读书心得】	韩丁笔下的农村文革	徐海亮
【文革忆往】	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	纪坡民
【研究动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陈东林
【不堪回首】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吴志菲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读书心得】

韩丁笔下的农村文革

• 徐海亮 •

2006年6月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参加文革40年的研讨会，该会议同时也是海外韩丁朋友们的一次纪念活动。我听说韩丁多次去过的长治张庄大队的书记也要前来，还特地嘱咐会务人员把他和我安排在同一房间。会上，王金红书记听我说希望知道农村文革的情况，就告诉我，韩丁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深翻》，就反映了长治农村的文革，我欣喜地问他，有韩丁的文稿吗？书已经出版了吗？他回答说已经印出来，邀请我到 he 家里去看。

王书记的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收藏库，他给我展示了他收藏的历史文件、文革传单印刷品、会议证件、农具和模型、自制的工艺品、各种照片，还有韩丁亲自题字的英文版《深翻》，以及翻译初稿的复印件。我第一次看见这部大书，问他已经出版中文了吗？他告知实情，并希望能够出版。尽管我很想通读这书，也不能贸然带走王金红的珍藏。不过，我象发现了重大地下宝藏一样，兴冲冲回到北京。我明白，就在我们许多人辛勤地发掘资料、采访当事人和撰写文革口述历史之前好多年，美国友人韩丁已经在海外出版了这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巨著。韩丁的朋友商老师 (Msachi Sandra) 那里也有复印的中文初稿，她慷慨地借给我；韩丁的妹妹寒春住在昌平沙河，她家里藏有英文原著，她也借给了我。

我开始读《深翻》、读了王书记主持编印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画册，我慢慢明白，有一位我们至今尚不认识的，生活到了21世纪的“白求恩同志”，有一位我们至今并不知晓的外籍文革研究家……

今天我们手上的《深翻》，一开始就交代了时间地点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党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领导的陈伯达，当然更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长治当时的运动，是在批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从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顾了文革前的历史：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这些回顾与交代是必须的，因为韩丁重返张庄，他要采访和记录他1948年离开后，这个村庄的所有变化，这也是周恩来总理请他回来的初衷；况且，我们清楚：不明白我们的农村和城市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到第六部分末尾，韩丁已经把我们带进了长治农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张庄和长治，乃至山西的文革过程。有意思的是，韩丁几乎是用一个小小的基层的典型，用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际生活、话语、心态，描绘了一幅浩繁、漫长的历史画卷。这几部，我以为是该书最传神的部分，它们牵动和触及了战争、土改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浓缩了一个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集中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更集中地记录了一个村庄的文革。如果这本书还出版不了，我想，甚至可以用一个名为“一个外国友人笔下的农村文革”的长篇，来独立地将这后面几部分在网络上公诸国人。

近20多年来，特别近10多年来，海内外已经有了好些文革历史的研究新作，文革研究开始走出ABC文革、概念化文革和简论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人物、地区、部门、事件做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民间的未定稿——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许多精彩的研究和个人回忆录书稿，仅能在研究者或某些特定群体中传递。我已经读过的有专门涉及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军队、工厂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还没有读过讲农民和农村文革的书；《深翻》是我读的第一本一个村庄继续革命历史纪实的巨著。《深翻》中英文的出版，我想韩丁是为我们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

尽管张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它坐落在抗战时八路军根据地和日伪势力犬牙交错、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和土地改革发动的一个关键地区——晋东南长治城郊。它处在中国农业合作化兴起的晋东南地区，张庄农民认真地参加了农村的每一重大的政治运动，几乎中国发生了什么，张庄人就议论过什么！不信，请读读韩丁忠实的记录。除张庄之外，韩丁的《深翻》里还介绍了一系列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山西先进典型，我们从张庄，也想到了他们全体。张庄处于城乡接合部，工业化的进程，使张庄的农民优先受到时代的洗礼，长北火车站就在庄外，一系列国营和兵工大厂，也征用了张庄的土地。长治飞机场离这里也不算太远。颇有历史的老校潞城中学，也在张庄。这里还有华北最大的天主教教区，教堂也在村里。由于张庄的区域政治文化渊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文革的大潮流必然席卷这个并不偏僻的乡村，工人和学生的文革运动深刻地影响张庄运动。说得更确切些，长治地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某一大派的武斗总指挥部和基地，就在张庄。后来部队被派过来制止武斗恢复秩序，指挥部也设在张庄。

你要张庄农民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你要王金红书记不热衷收藏文革文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和工业化的村庄。

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它的特殊典型性超过了我现在知道的所有村庄。

文革运动中，我并没有去农村地区串联，后来搞教育革命调查，也只是去到专县以下做“专

业和教育”问题的徒步考察与调研，没有涉及过农村文革运动的事情。当年陈永贵向中央建议开展农村运动要保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我们读了中央批转的陈信，都很赞成，有的同学进而还提议说，文化革命运动，对于县团级以下的干部应该是正面教育，不要铺得太开。

1968年开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学师生和省直干部下乡，帮助大队一一建立春耕临时的领导班子（湖北当时大队一级多处于瘫痪状态）。我才对于当时的农村造反夺权事实和原来基层干部的心态，略有所知。1970年春，我从部队锻炼出来，被分配到河南与安徽交界的沈邱县，和该县的工作队一起进驻全县的整党重点大队，与县、社、队干部一起参加了整整两年的“一打三反”“整建党”和“农业学大寨”“批陈整风”运动。我们工作队的国家干部，多是当时说“站错队”的“保守派”，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轻的红卫兵还要左倾和幼稚！我和一个生产队长睡在一个大床上，也接触了大量的农村新生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白天下地生产，搞土地平整、田间水利配套、种植水稻；晚上开会，批斗农村“走资派”——原来的大队书记，批斗地富分子，学习“九大”党章，发展党团员。除了沈邱没有发生激烈的派性冲突外，韩丁在《深翻》的写的大活动，都有类似之处。读张庄的文革运动记录，使我有特别的亲近感，我清晰地回忆起自己的农村学大寨、整风生活，从新的角度，悟到了好些当年参加文革没有悟到的东西。

我在武汉以大学生身份参加文革，比较熟悉的是大型工业和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毕业以后到河南生活、工作了24年，才感觉到河南的文革基本上反映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和政治文化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河南的造反运动基本上是一次农民造反运动，才开始体验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底层、共和国历史对于文革的根本影响。对于这些根本的东西，韩丁的描述，以及他文字不算太多的议论，都有极其深刻的表现。可以说，读者会从《深翻》里读出在我们这个悠久农业文化的国度中，文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我非常佩服韩丁，他异常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民，忠实地记录下张庄农民的语言、心态。在文革时期张庄农民妙趣横生的话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让文革后的人真正知道那个时代我们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尽管如韩丁书里所说，当事人后来谈起文革中的纠纷冲突，也忍不住笑起来，但我希望后人真正弄明白我们这一代，明白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义的青年会如此去追求与奉献。书里通过文革时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农村社会、风情、民俗、传统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的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我不知道中国的学者们会如何看这本书，但我认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在美国人韩丁的这本书前汗颜，我们本来应该像他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深掘具体的文革学与泛义的社会学题材，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去高谈阔论。和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样，韩丁的书也可以看做“文化革命中的山西农民群众”。

过去一个阶段的文革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这是类似心态史学那样的精神产品。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文革运动造就了某种历史的悲剧。其实，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没有浸浴着特定传统文化的亿万人民群众和干部——包括我们这些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文革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倾情投入，文革也不会成为那样的文革。韩丁在《深翻》里评议了——乃至批评了中央的高层领导的主观设想和客观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或许我们今后可以越来越多地读到中国人写的基层文革斗争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不会忘记韩丁《深翻》的非凡贡献。

韩丁并不是以一部《深翻》来跻身于文革学界的。众所周知，他1971年来华，在周恩

来的安排下，最先去了二七车辆厂和清华大学，考察了那里的文革运动和斗批改活动。他最先写的有关文革的记述，不是1983年出版的《深翻》，而是1972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出版方为美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每月评论》。

当然，韩丁也从他的典型研究里，得出对于宏观文革的认识。在书里，他深有感触的是派性和农村宗派纠葛扭曲了继续革命，他看到了军队介入运动的负面问题（而不是简单庸俗地把运动看成是所谓“拥军”和“反军”的矛盾），他更看到了山西、全国的党内斗争。住在张庄大队，他看到了长治，看到了山西，而且想到了全国。他在1971年的来访，与周总理和其他高层官员接触，开始有了基本的、客观的印象与认识。1980年前后他写作《深翻》，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对于文革运动有了新的价值判断，韩丁一方面紧密地与党中央保持认识的一致，一方面也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继续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可以在他在《深翻》之后的论文、专著里看到。

他在《深翻》最后的一个小节“再见吧！张庄”中有这样一些段落概括了1980年代初的认识。

韩丁对于运动中的派性破坏了文革初衷非常痛恨，对于一些形式主义的“革命”概念也极为怀疑：

“有一个时期，文化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它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时，他好象已被贬为最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厮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能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残酷竞争，那么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的话）就象在政治上相互残酷倾轧。似乎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权力。夺权政权和巩固政权不仅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且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唯一活动”。

“在‘无产阶级’中国则不然，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登上领导岗位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没有其它夺权场所，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因此也就没有判断谁能够、谁应该掌权的客观标准。文化革命的组织者们五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谁该掌权要看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政策，根据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如果区分两条道路却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吗？‘大队核算’就是社会主义吗？李英奎说程首创是叛徒，他就推动了革命了吗？程首创叫李英奎反动军人，他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李快腿鼓励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小申吸收富农儿子秦根寿为新成员，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吗”？

“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呆了一个月，然后又在清华大学住了三个星期，我了解到足够的情况，证明中国的派性斗争是无原则的。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把派性斗争看作是过度的行为”。

“1971年，我觉得毛确实为文革的派性问题而懊悔，并且看出派性是一场灾难。他三番五次采取措施制止派性，但是他的悔恨，显然已不足以制止那些激发和激化派性的活动”。

关于文革运动的价值判断过程，韩丁客观地记录了：

“毛还在世时，评论就已开始承认文化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称是‘为了保卫和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绝对必要的运动。’毛逝世和‘四人帮’垮台以后，新闻喉舌开始批评某些过度行为是极左，并把这些归罪于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帮’。1979年10月，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最终谴责整个文化革命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浩劫’。评论界则称为‘失去的十年’，这一表达和千百万人民的亲身经历相吻合（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他们长期在乡下劳动，甚至被当作政治犯惨遭严刑拷打，并且株连到亲友，导致亲朋好友的死亡）。

韩丁提出了否定文革，将导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反思：

“这次历史的修正，把解放后约1956年作为革命的转折点；前进与后退，正确政策与左倾政策之间的分水岭。在指责毛后来的一切做法时，他的批评者避免以任何具体方式提及毛在那时经常强调的问题——关于发展和巩固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既然他们否定了各种关系，把公社、合作社，甚至生产队都看不成熟的东西，那么巩固这些创举的文化革命，自然轻而易举地予以否定了。‘失去的十年’也就无需再解释了”。

无疑的，正是基于他对中国农村变革历史的研究，韩丁在分析和批评文革的同时，对他诚心拥护的“改革开放”前途存在一些疑虑：

“当毛的超级尝试——文化革命陷入无原则的派性斗争的困境，当毛不得不命令部队去阻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时候，很清楚，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四人帮’挑战的痛苦和愚蠢，以及华国锋政权真空阶段的不稳定的状态，显示了长期演出的戏剧的凄惨收场。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受害者、斗争对象、旁观者和勉强的合作者，结成反动派联盟执掌大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他们不仅摧毁毛领导下建立的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等上层建筑，而且还摧毁了曾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山区工人进行集体生产，商贩进行合作贸易的经济关系。通过重新恢复毛十分激烈谴责过的一切实用主义和利润挂帅的政策，中国新的领导人为那些人力充足、资源丰富的人们，利用新获得的‘自由’发家致富开通了道路”。

从而，韩丁又反过来维护了毛泽东改革中国社会的意图、初衷，维护了他批评了种种现象的文革，展望着未来的中国：

“毛进行的斗争虽然被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扭曲了，但它显然不仅仅是为解决权力斗争问题，而是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因此没有人能轻易调和对抗者相互抵触的政策，或是由此而产生的两种显然不同的世界观。

毛的创造被击败，能够证明批评者的正确吗？毛的纲领是十足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极左的唯意志论吗？”

“尽管毛激起的群众运动远未达到其预定目标，尽管这些运动未能创造出各种新体制，以便培育毛认为至关重要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以及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但是把亿万人民推向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促使他们去研究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并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韩丁毕竟不是专门从事文革和历史学的研究，写作《深翻》时所依据的资料和资讯也是不完整的，他在本文学作品、其他论著里对中国文革的印象、探讨，并非对张庄或长治——乃至中国文革运动的一种最后结论或者裁判，我们也不苛求与指望任何个人来对这么浩大的、亿万群众参与的历史急忙地做一个“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结论。但是，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的文化，是真心诚意热爱的，他实事求是、客观地记录了他看到听到的文革片段，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贵史料。在唯心史观盛行，一些

风头出尽的“学者”可以任意“创造”和曲解历史的今天，“老农夫”的韩丁真诚留下的文字和他与时俱进的认识，都是文革口述历史研究的珍品。

~~~~~

## 【文革忆往】

### 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

• 纪坡民 •

李小林约我为纪念她父亲李雪峰写点东西，这使我有点为难。小林的意思，自然是写李雪峰和我父亲纪登奎之间的往事。可是对我父亲过去工作上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对李雪峰和我父亲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工作关系和交往，也了解不多。只是从1988年起，我才去看望过李雪峰。不过，从一些不多的接触中，对这位老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想，我就从李雪峰最初在我心中的印象谈起，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

#### ◇ 我青年时代印象里的李雪峰

“文革”前，我就听说过李雪峰的名字，知道他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领导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李雪峰成了政治明星。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一个“战役”，便是“彭、罗、陆、杨”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6月1日，报纸电台公布了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那时候，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可是不久，“文革”高速运转的漩涡，很快又将李雪峰卷进“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里去了。后来，可能是“文革”中检讨错误的态度比较好吧，而且因为他是毛主席十分信任的干部，1968年，李雪峰又“站出来”了。先是听说要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不知后来起了什么“梗子”，又搁置起来了。拖了一段，以后又“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那时候，我父亲在经历“文革”约一年的批斗和关押之后，也被“解放”了，被“结合”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时，我是军事院校的学生，在1966年10月初林彪发出“军委紧急指示”之后，也参加“文革”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地方上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一样，东跑西跑地“串联”。关于李雪峰的这些情况，当时就听说了，不过那时候“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也都知道这些。

1969年春，我因为在“文革”中“关心国家大事”而“犯了事”，正在受审查、住“牛棚”。在听传达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时，我才十分惊异地知道：我父亲竟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还有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

“文革”时的故事，说起来也怪。在“文革”前，人们一般的印象，所谓“路线斗争”，是党内而且是党中央的事，不仅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许多党的领导干部也够不着过问“路线斗争”这种事情。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而且一二十岁的青年学

生，都搞起“路线斗争”来了。于是，大概原来用来管理党的高级干部的那些“组织原则”，也波及和延伸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来了。作为干部家庭成员，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跟着“沾了光”。不过，也许同现在社会上许多人想当然的印象有所不同，这种属于党的高级干部“组织原则”的“待遇”，却一点儿也不令人羡慕——那是一种其复杂微妙要靠“存乎一心”去细心体味才能领悟个大概，而且其严峻苛刻又达到可怕程度的“规矩”。相信“文革”中遭遇人生坎坷的高干子女，在有了亲身经历和体验之后，对此都能领略一二。

就我而言，父亲纪登奎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没有给我这个当儿子的带来什么好处：1969年秋，我仍然戴着“五一六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档案里装着“黑材料”，背着处分、被部队开除回地方，在河南一个煤矿“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也可能是由于有这段“牛棚”经历的缘故吧，李雪峰的名字，在我的脑子里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自1969年到中央工作了七八年，我在河南一个县里呆了七八年。县里的条件，电视那时还没有，报纸也很少看，从广播大喇叭里，党中央的那些“国家大事”，也只是知道个大概。不过，李雪峰的名字，不知什么时候在中央领导人里又听不见了，对此还有一点印象。至于父亲在中央干什么工作，我几乎一无所知。“九一三”事件后，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参加了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可是，对父亲搞林彪专案审查工作同李雪峰后来“听不见了”有什么关系，我那时一点儿也不知道。

#### ◇ 李雪峰再次卷进“文革”的政治漩涡

欧洲有一位哲人说过，人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可是如果把“文革”比作一条河流，它似乎像大海一样宽阔得没有尽头，而且还充满“大风大浪”。“文革”初期，李雪峰在这场“大风大浪”中游泳，好不容易才从“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中解脱出来，但没过几年，又卷进了一场更大的政治漩涡。这一次，他遭到了灭顶之灾。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一个如今知名度很高的事件，那就是所谓“华北组简报”的公案：中央全会分组讨论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发言。那个时候的中央委员们，说起来也都是老干部了，却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小将”一样，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就群情激愤，纷纷发言响应，“狂热”中迷失了“理性”。

会议讨论的情况当然要上报，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这样做，对李雪峰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有闻必录”，这也是他的责任。

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两天半时间，200多名中央委员还在群情激愤，政治潮流几乎已经“一边倒”了。但两天半之后，毛主席震怒，群情激愤的政治潮流马上偃旗息鼓。“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后来，“上纲上线”越来越高，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被说成“反革命简报”。在“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当年的中央委员们，连应不应该“设国家主席”这样大的道理都没有人敢去分辨，谁还去理睬“简报”工作的程序和职责这类细枝末节的小事呢？于是，李雪峰又一次卷进了一场政治斗争的大漩涡。

#### ◇ “林彪事件”后我父亲经手审查李雪峰

在毛主席针对林彪的“甩石头”、“掺砂子”、“挖墙脚”的所谓“三大措施”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1970年底召开的“华北会议”。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回忆，这次会议的气氛，严峻和紧张得令人窒息，会议从追究“陈伯达为什么在华北乱跑乱说”开刀，揭发、批判、追查，搞了一个多月。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

军区。这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中的关键步骤——“挖墙脚”。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

开始，我父亲在历史上是否同李雪峰有过直接的工作关系，我不太清楚。后来听李小林说，李雪峰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我父亲在河南许昌地区工作，曾是上下级关系。不过，抗日战争时期，李雪峰已经是中共太行区委书记，我父亲只是冀鲁豫区的一个青年干部。20世纪60年代，李雪峰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我父亲在河南只是个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在革命队伍里的资格、职务和地位，他同李雪峰相差得很悬殊，所以大概也够不上有什么历史的恩怨纠葛。可是，“文革”汹涌激荡的政治漩涡，却阴错阳差地把我父亲摆在了李雪峰的对立面。

庐山会议时，中央安排我父亲留京值班，等他换班上庐山时，这场政治大戏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所以很幸运，他没有什么事。

那时候，我父亲在中央算是年富力强的，周总理总是戏称他“壮丁”。庐山会议后，可能也是因为在庐山这场事里没有什么问题吧，毛主席压给他的工作担子更多了，他承担的责任更重了。在毛主席针对林彪的“三大措施”中，我父亲唱的都是重头戏。

尤其是“挖墙脚”，“华北会议”时，奉毛主席之命，他不仅参加了，而且是会议主持者之一，唱的是“黑脸”。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和中央又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

“九一三”事件后，我父亲又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毛主席和中央还指定他和汪东兴负责“林彪专案组”的“日常工作”。所以，审查李雪峰的问题，也是归他管的。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也是我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以后决定、并经手办理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雪峰先后两次卷进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我父亲却仍然在“文革”惊涛骇浪的政治漩涡里，“经风雨、见世面”。

#### ◇ “文革”之后我父亲和李雪峰的一段往事

终于，“文革”的灾难结束了。我父亲在“文革”中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干了七八年，自然也难辞其咎。挨批判、作检讨、受审查，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走完这些党内斗争的例行过程之后，他于1980年春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文革”结束以后，对党内斗争问题的处理宽松得多了。作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我父亲很幸运，不仅没有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连“文革”时期“批斗大会”那样的罪也没有受过，只是闭门思过、在家里赋闲而已。

家里客人很少，可谓门可罗雀，父亲心情不太好，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家里来了一位稀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雪峰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之后，他到家里来看望我父亲了。有客人来，父亲自然高兴，而且来了这样一位体面的大人物。

当然，对我父亲在“华北会议”上扮演“黑脸”并经手处理李雪峰问题时的角色，李雪峰不会不知道。不过，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倘若对我父亲心存芥蒂，还是耿耿于怀的话，对一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充其量，他不登门也就是了。后来，父亲曾多次谈起。



李雪峰见到我父亲，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吆，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

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他介绍了当年李雪峰的公案里这样一个故事。

1973年，林彪事件审查结案，我父亲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我父亲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谁知毛主席听了以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

关于毛主席这段话，我听父亲讲过好几次。他打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很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的。意思是，你纪登奎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关于李雪峰不开除党籍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被开除了党籍。

这一件事，李雪峰在平反以后，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他见到我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指的就是这件事。李雪峰表现出的开朗、幽默、豁达、大度，仿佛他根本不曾因此受过七八年的牢狱之灾，竟然还有心思把我父亲当年未被采纳的一个提议当作玩笑开，而且用特有的语气，传达了他对我父亲的理解和体谅，也许还有几分赞许和夸奖。其实，我父亲当年并没有公然顶撞毛主席，也没有固执己见，只是按照事实材料同他“存乎一心”的“规矩”拿捏掂量一番以后，谈了自己的意见，没有多用心思去领会揣摩毛主席的意图而已。

李雪峰的一句话，大概使我父亲的心理负担涣然冰释，无疑使他感到欣慰。他们那一次见面，似乎谈得很投缘。他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自然不知道，只是后来又提起这次见面时，听父亲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

“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从此，他们两人时有来往，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也觉得颇为新奇：这些看似严正刻板的老革命，性格也如此可爱呢。

后来，我问父亲：你的提议被主席驳回了，可是，郑维山却没有被开除党籍，为什么单独把李雪峰开除党籍了？主席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李雪峰？父亲严肃而沉静地说：“主席对高级干部政治上特别严格，尤其是对政治局的成员。”

父亲去世后，有一次当我去看望吴德时，像个傻子似的问吴德：“李雪峰是不是林彪的人？”吴德笑起来，说：“他哪里是什么林彪的人，历史上，李雪峰是邓小平同志的老部下嘛。”

我又问他：“那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处理李雪峰呢？”吴德回答我的话，同父亲的回答竟然完全一样，连一个字都不差，甚至连严肃的神情和沉静的语气都一样。

这使我感到诧异：他们这些老革命的思想 and 语言，怎么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发现，李雪峰虽然年愈90了，思想却一点儿也不僵化和保守，对新时代的知识仍然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记得我曾将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送给他，原本也只是让他知道我还能写本书，让他觉得他的好朋友的后代还有点出息。

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那本书李雪峰后来竟然还真的看了。一年后，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见到我，他从病床上相当吃力地抬起身体，慢慢地说：“坡民啊，你那本书，写的那个什么罗马法，很不错……”他似乎还要对“罗马法”发表点议论，可是被来探视的客人打断了。两年后，我又去医院探视，送给他我的另一本书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因此，我永远忘不了，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说的竟然是“罗马法”。

□ 《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

~~~~~  
【研究动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 陈东林 •

一、一般研究状况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81年

这一时期，主要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制造的错误理论，拨乱反正，揭露“四人帮”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由专门机构组织撰写，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完全等同于学术研究，有些政治性评论语言如“‘四人帮’代表党内资产阶级”等，以后不再延用。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和彻底否定“文革”宣传教育运动的推动，以及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文革”时期经济数据的带动下，发表了一批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的学术论著。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全面，具有专业深度，是本课题研究至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十年内乱时期破坏那么严重，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民经济还有一定增长速度的问题，文章回答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比“文革”前14年和其后6年的速度要低，之所以还有增长，是因为能源工业上得快。文章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文章最后还总结了“文革”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陈雪薇的《关于1966年的工交座谈会》，阎放鸣的《关

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完成》，程中原的《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较少，只有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一部。该书实际是他们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中的一部分，虽然篇幅不长，但史实清晰，叙述中肯，资料比较丰富准确，利用了刚刚出版的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的“文革”时期经济数据，填补了这一时期没有总括性研究的空白。针对“文革”时期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该书指出：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趋于僵化；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该书也指出了“文革”时期取得的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个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结论，与此前许多论著相比更为实事求是，为以后研究“文革”经济的学者们所普遍接受。

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在相关的经济行业史中，尤其是《当代中国》丛书的相关卷，如经济、财政、工业、农业、商业、外贸、金融等专题卷和各地方卷中，专章分析了该行业、地区“文革”时期的状况，虽然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都比较抽象概括，但毕竟使“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了。比较有深度的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卷，该书对1969～1972年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评述，认为后果是：盲目下放，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作用。结论是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变动，不仅没有克服原有弊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时期通史体裁的党史、国史、“文革”史中，也相应介绍了“文革”的经济状况，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等。但这些书主要是从政治史角度审视“文革”，经济方面只附带涉及。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以“文革”发动30周年与结束20周年的1996年为起点，以迎接建国50年的1999年为高潮，对“文革”经济状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开始了观点争鸣。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较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著作，但相当一部分属于高校教材性质。它们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或者沿袭成说，或者抽象论述，互相雷同，没有多少创新。也有一部分著作建立在较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性的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仲藜编著《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文革”经济的专题性著作较少，仅有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等几部。其中，马泉山的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严谨结论。书中对贯穿“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的评价是：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其效率与效益的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得到补偿。

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1967～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1969～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使“四五”计划得以完成；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5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5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

对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各方面论著都有共识。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这表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陈东林从四个方面对这些损失进行了具体分析：（1）武斗、造反、打砸抢、停工停产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质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2）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较缓慢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以完成，但“三五”计划本来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的较高指标则被大大压缩。（3）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4）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均年消费粮食1976年低于1952年水平；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其间只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增加。

但对这种损失达到的程度，即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评价，各方面论著的看法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下简称“崩溃边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以下简称“有所发展论”）。除此之外，境内外还有一些舆论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不是“濒临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另外网络上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后两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得到认同，本文不予评述。

二、分歧与讨论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报告为什么要把“崩溃的边缘”界定为1974～1976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四人帮”是在1974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下，对整个“文革”还是肯定的，能否定的只是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以后的那段历史。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仅“分田单干”、“资本主义复辟”等被作为“崩溃边缘”的内容，就连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而取得重要经济成就时期也被包括在“崩溃边缘”了。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

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做报告说：“到了1976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超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说法，明显的是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说法的延续。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文革”时期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1993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1990年，胡绳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从而为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按照这一评价准则，“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

学术界的争论始于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文革”十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1965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濒临崩溃边缘”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但由于时间所限，会上未能展开讨论。

1997年2月，王海光在《“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中说：“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经济情况时，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革”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所谓“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同年底，陈东林发表《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一文，从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公开评述。由于发表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并未引起较多关注。1999年5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不仅许多杂志、网站予以转载、摘登，中宣部《社科动态》（1999年12月1日）予以摘报，香港《星岛日报》（2001年8月26日）甚至德国《BERLINER CHINA—HEFTE》也予以转载。陈文的主要观点

是：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在阶段发展指标上，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99%，翻了一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从生产水平看，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立起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和布局不合理等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197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26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1966～1978年，石油工业原油产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科学技术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陈文上述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2002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这种速度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文革”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文革”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它的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革”，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两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索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然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1975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濒临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1）“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有人举例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由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实际是到了崩溃的边缘。（2）“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将会得出另一个结论。（3）“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4）邓小平在1978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不赞同“濒临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1）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2）“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3）1965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濒临崩溃边缘”中完成的，无法解释。（4）邓小平曾用“濒临崩溃边缘”并不代表他的评价。有资料证明，1981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中国境外的说法，也有不同。1992年，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出版。该书没有用“经济崩溃”而是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期间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年）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2006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季度研讨会，主题为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说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中断了三年，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没有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1970年5月14日通知，要求从1970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1971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报送周恩来。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300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1980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一五”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文革”十年既有欠账、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既要看到教训，也要对确实增长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对外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在1979～1984年连续五年增产，与“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期间

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在新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总体上应属于“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1966～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10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3%～4%，相当于这一时期（指1957～1976）经济增长率的1/3～1/4”。因此，他没有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分力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时代所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趋势，只是深刻地影响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速度。”

2007年2月，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书中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书中以1976年为坐标，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铁路交通运输、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消费水平、中小学校及在校生总数、医院床位、全国人口死亡率、打破体育世界记录次数等方面，与1949年进行了比较。据了解，这一写法在征求意见时，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经该书编写组报中央申明理由后，保持了这一写法。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是增加了“一度”两个字，和薄一波著作中1967年、1968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三、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限于对经济学不够了解的弱点，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限于对政治大环境的把握和研究不够，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

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然表示“濒临崩溃边缘”应当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离开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是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著作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败掉了1949～1979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同等的一份家当。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即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文革”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也是颇大的。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如上世纪90年代某些年全国国有企业的效益即低于“文革”时期。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9%的模拟结果。”

（二）由于“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1. 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

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反而低于1952年的395斤，这主要是当时粮食出口和“备战备荒”的需要，和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时期，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1965年的536斤提高到了1976年的612斤。

2. 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而必付的代价

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遏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牺牲。

3. 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80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可见，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以调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经济数据，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战略目标、认识局限等动态来进行分析的课题。笔者期望经过这种研究，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

#### 【不堪回首】

####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 吴志菲 •

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

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主席。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 ◇ 执行“紧急任务”，我的心在流泪

1968年底，我从北京举行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回到了开封驻地，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那天晚上，天气有点冷，风也很凉。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象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这时我借着月光，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

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主席——刘少奇吗？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老人。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三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 ◇ 戒备森严，我们也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因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然而，这次重来开封，已是物似人非。刘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 ◇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们完全接替监护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伙计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

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 ◇ 偷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的抗议。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作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孔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了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床白被单。

#### ◇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我们戒严现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逃亡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三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地下室很小，屋长不够身長，只好把停放遗体的担架斜摆着。

刘少奇主席的老卫士长李太和接到刘少奇的死讯电话后，匆匆赶往机场，飞到开封，直奔地下室。盖着白被单的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如雪的白发蓬乱着，足有一尺多长。李太和悲痛万分，他含着泪细细地给老首长修剪长长的白发，轻轻地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用一套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裹住刘少奇骨瘦如柴的身体。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朵白花，有的是漆黑的夜幕与

那嘀嘀嗒嗒的秋雨。我们组织 20 多人把小小的火化场戒严起来，到了火化场，安排有人在那里喷洒消毒剂。按规定，在死亡登记表上要注明具体病因，可是那天，上面只填了“传染病”三个字。老司炉工不解地问：“到底是哪种传染病？”有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催他快点火化。

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消失了。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鲜花，没有党旗，火化结束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出去。

历史自有公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 14 年后，终开昭雪了。1980 年 2 月，“文革”结束后的第四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五中全会公报广播的那一天，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阴云散去，春光普照，若九泉之下有知，也该含笑，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可以安息了。

□ 《党史纵横》2008 年第 4 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